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影响

张万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抗日宣言通电,号召中国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在其影响下,流亡入关的东北流亡民众组建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率先在全国开展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及反帝大同盟盟员等全力支持这个抗日救亡团体,在抗日救亡宣传、帮助组建抗日义勇军方面付诸了大量心血,从而使救国会在抗战初期的地位与作用凸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行之有效地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开展工作,除了其能在民族危亡时刻客观分析形势、制定出正确方针外,其统一战线政策是团结制胜的法宝,为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积累了一定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抗日义勇军

中图分类号:K2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21)01-0177-08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1.01.019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民众自发组建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对于唤起中国民众尤其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组建东北抗日武装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围绕该团体的组建过程、历史作用及其与张学良等重要人物的关系方面,以往有一些成果问世,而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影响尚未有过专门性的研究。笔者愿就所及,从中国共产党对该团体制定的方针政策、付诸的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初步探讨,以此管窥两者之间关系,从救亡的侧面诠释中国共产党在十四年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抗日宣言是救国会组建的促进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抗日宣言和抗日主张。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天,在反日斗争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制定对日策略,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1年9月20日、9月22日和9月30日,中共中央陆续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在中共中央发表的抗日宣言、决议的指示下,9月21日和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等。概括来说,这些决议与宣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从中共中央到中共满洲省委都无情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阴谋实质和

收稿日期:2020-10-16

作者信息:张万杰,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东北救亡运动史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国际价值研究”(15@ZH025)的阶段性成果;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RHDC202108)阶段性成果。海南省统战理论研究(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基地)的阶段性成果。

目的。宣言切中要害地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①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分析日本占据东北的目的是“企图屈服中国民族在他高度的威胁、压榨与剥削之下,增加他的利润,增强他在满蒙华北的统治,来解决他国内的经济危机,并进一步的准备争霸东亚的帝国主义大战”,并揭露其实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②

其次,严厉地批评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尖锐指出国民党集团推行的反动政策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施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才使日本有机可乘,“有了国民政府的默契,是国民党外交政策必然造成的结果”。^③同时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依靠国际联盟调停的政治幻想,揭露了国民党所谓的“忍耐”“镇静”的卖国投降主义实质。鉴于此,1932 年中共满洲省委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国民党统一政府的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直接统治,更必要推翻国民党各派的统治”。^④

第三,号召民众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抗日。中国共产党最早号召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抗日,表明“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⑤193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以伍豪为笔名在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 20 期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的任务》,指示满洲省委要将东北民众武装起来,组织救国军或义勇军进行游击战争,发动民族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宣言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中国树立起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旗。极大振奋了全国民众以爱国主义为主旨的民族精神,有力地促进包括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内的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推动了东北抗日武装的组建进程,为东北救亡运动和东北武装抗日同时指明了前进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以东北军为主体的东北各阶层民众流亡入关。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爱国流亡人士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车向忱等得到了张学良暗中支持,于 1931 年 9 月 27 日在北平西单旧刑部街 12 号奉天会馆内组建了东北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不限东北籍人员,凡有“国家观念,有国家理想主义者,为进行武力抵抗日军之人员”^⑥皆可入会。成立的目的在于东北流亡民众团结组织起来,复土还乡,打回老家去。

救国会成立之时发表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宣言》。宣言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痛述了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造成的灾难,“破坏我城镇,屠戮我人民,焚毁我房屋,劫掠我财产”,以至于“大好河山,尽葬送于倭奴炮火之下”。其次,针对的日本侵略政策,宣言指出“吾人回忆过去日人对东北之设施,无一非亡我之工具;所谓满蒙积极政策,殆为全国上下公然不讳之事”。再次,宣言号召东北人民必须进行武装反抗。“咄彼倭奴,欺我太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同舟共济,武力抵抗,速起自救,“与倭奴决一雌雄”,“为主持正义而

①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1 年 9 月 19 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9,1988 年,内部出版,第 47 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83 页。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 83 页。

④ 《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国民党统一政府的宣言》(1932 年 1 月 17 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9,第 174 页。

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 49 页。

⑥ 王驹、邵玉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1 页。

战,为保障和平而战;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宁起见,均不得不出于最后之一战”。^①这三项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共对其影响可见一斑。

不同的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宣言》中只提“抗日”“救国”,而不提“反对国民党”,这是与中共抗日宣言的本质区别。救国会张学良方面的爱国人士组建的,救国会领导人和张学良一样,最初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故宣言中对国民党抗日方针的表述上较为温和含蓄,“而我当局本忍辱负重之训,为息事宁人之图,始终开诚布公,力持镇静,借以期望悔悟,稍知顾忌”。^②之后,救国会又分别6次致电国民党中央、各级党部,敦促其对日宣战,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其言语恳切,“督促党国领袖,激发天良,通力合作,共赴国难”,^③“所望党国领袖诸公际此国家存亡之关头,立弃旧嫌,再图团结;救东北,即所以救中国,救中国,即所以救自身”。^④但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和国民政府的步步退让,他们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逐渐产生了质疑,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抵沪宣言》中流露出不满和批评,“始以国难以来,反置国难而不谈,终以分开四大会而散!统一无望,对外无力”,“团结终于未成,统一永陷绝望,内心隐痛”。^⑤这是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思想上的一个变化。

二、中国共产党对救国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抗日大局出发,制定了对抗日救亡团体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在1931年9月22日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指出,“要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他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⑥不可否认,决议中还存在一些“左”倾思想的痕迹,但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抗日救亡团体支持的方针,并开始进行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探索。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对其高度关注,先后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及其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参加救国会,支持和帮助这个新生的抗日救亡团体。他们通过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吸引更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共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常委会是救国会最高领导机构,改选后的常委15人,执委41人,委员27人。常委会下设宣传、总务、军事三个部门。总务由卢广绩、高崇民负责,宣传由阎宝航、车向忱、杜重远、霍维周负责,军事由王化一、熊飞等负责。这三个部门的负责人同时是救国会的常委。在救国会宣传部、军事部、总务部干事中,都有共产党(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如赵长泰担任总务部干事,张希尧、郑洪轩、宋黎、张金辉、黄宇宙等为宣传部干事,张新生、韩天佑、王大增为军事部干事。冯基平、夏尚志、张一吼、李兆麟、宁匡烈、徐靖远等党团员也都加入了救国会。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进步青年“虽然不掌握救国会的领导权,确是救国会的中坚力量”,^⑦是救国会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和实施者。

值得一提的是救国会选举的41名执委里有3名中共影响下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救国会成员以东北流亡学生和在北平的东北籍学生为主体,故救国会执委推选了3名学生界代表——冯基平、夏尚志、张希尧。他们当时的身份分别是中共党员、团员以及进步青年,到1933年初

①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73页。

②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974页。

③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978页。

④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979页。

⑤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978页。

⑥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

⑦ 王驹、邵玉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15页。

已全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救国会这 3 名执委在救国会中能有效地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贯彻实施。如冯基平、夏尚志两人被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秘密派遣到救国会中开展工作,公开身份仍是学生,但冯基平秘密担任着中共北平市委军委东北炮八旅旅委书记,夏尚志担任着中共共青团河北省委反军国主义部干事。张希尧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被称为“东北学生中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①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 3 名学生执委的影响下,一些爱国青年加入到救国会中,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如冯基平吸纳了北平讲武堂的张一吼,而张一吼又介绍了共产党员李兆麟到救国会中。这几个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第 24 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要领导者。张希尧介绍了东北大学的同学和同乡张金辉、郑洪轩、刘韶九、宋黎等加入了救国会的宣传部。这些东北大学学生成为宣传抗日救亡以及到关内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积极分子,在救国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从而达到对救国会的指导、支持和帮助。

针对救国会内部成分复杂、派别斗争尖锐的客观情况,如何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救国会有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等派别,救国会常委则属于无党派爱国人士。这些人对于救国会的职能和定位有着不同意见。国民党人梅佛光、吴焕章、黄剑秋、钱公来等人主张救国会应该筹集捐款,救济东北难民,至于抗日问题必须听候国民政府指示,这引起了高崇民等救国会常委们的不满,以至于他与 CC 派的梅佛光在执委会上发生了言语冲突。青年党在救国会影响也不小,霍维周、王慎庐、王捷侠担任救国会常委或委员,他们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持批评态度,要求举国抗日对敌。宣传部副部长霍维周发展了一批东北流亡青年加入了青年党。在救国会派别林立,且国民党实施“剿共”政策之严峻形势下,救国会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身份,不得不采取隐蔽的工作方式。最初被派到救国会的中共党团员没几人,但他们通过党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进步青年等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努力做统一战线工作,做广大青年的思想工作,逐渐得到了他们信任,积极在救国会中发展干部。张希尧是常驻救国会的执委,他在救国会宣传部努力工作,获得宣传部长阎宝航、副部长车向忱、军事部部长王化一等人的高度赞许。救国会常委车向忱、阎宝航等人对中国共产党好感与日俱增,逐渐产生了政治认同。同时在张希尧影响下,胞弟张金辉、学生宋黎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救国会宣传部干事郑洪轩于 1932 年春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很快在救国会发展了 3 个反帝小组——救国会反帝小组、留驻北平的抗日义勇军小组、制造飞雷小组。他还发展了 10 多个反帝大同盟盟员,成立了救国会的反帝大同盟支部,这 3 个小组和反帝大同盟盟员大多数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郑洪轩于 1933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到 1933 年,救国会中的共产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盟员明显增多,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据救国会常委阎宝航回忆,“1933 年以后,‘救国会’基本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救国会的骨干”。^②

为了团结各派力量一致抗日救国,中共北平市委指示救国会中的党团员干部,尽量采取团结和联合的策略。救国会干事郑洪轩曾不满救国会领导层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对某些东北义勇军将领的不公正做法和态度,准备发表反救国会的宣言。中共北平市委得知后,指示他不宜采取公开反对行动,要团结他们,注意工作方法,重点任务是“宣传、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③在民族危亡之时,中国共产党采取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有效地联合了张学良系统、国民党系统、青年党系统等各方面救国会成员,同仇敌忾,共克时艰,从而扩大了救国会在社会上的影响。

① 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 2 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05 页。

② 阎宝航:《回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宝航纪念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97 页。

③ 郑洪轩:《我所知道的党在东北救国会的工作》,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辽宁党史资料》第 3 辑,1988 年,第 15 页。

三、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救国会人员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救国会将抗日救亡宣传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作为两个主要任务,中共北平市委则全力支持。中共党团员及进步青年参加救国会的抗日救亡宣传团,不仅在国统区,还冒险深入沦陷区或抗日前线开展救亡宣传、慰问活动,这对于唤起广大军民的抗日救亡意识及鼓舞抗战官兵的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共北平党组织指示救国会的党组织,救国会对外宣传要将反对日本侵略与反内战、反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之内容贯穿其中。也就是说,要通过宣传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实质,改变救国会及广大民众对国民党抱有的幻想。张希尧、郑洪轩等率领东北流亡学生宣传队深入东北沦陷区绥中、兴城一带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使广大民众认识到国民党不抵抗的实质。193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平军委指派冯基平等人以救国会名义带领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到平绥沿线开展救亡宣传。他们辗转于张家口、大同、集宁、归绥、包头等地,驻集宁西北军傅作义部的苏开元团及队伍中的东北籍官兵深受鼓舞,使之成为同情和向往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敦请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1931年10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了628人的赴南京请愿团。中共河北省委派了5名党员作为临时的党的指导机关,在请愿团中建立一个中心支部,^①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爱国进步青年积极参与其中,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国民党方面称请愿团中“有共产分子参加在内,散发反动传单”。然而国民党政府对请愿团的抗日请求推诿搪塞,令包括救国会常委在内的广大东北流亡人士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救国会同志一致认为“中央不抵抗,我们自己干去,打回老家去”。^②

救国会慰问团亲赴前线进行慰问宣传,将救亡思想传递给前线官兵,同时也将国共军队抗日情况、国共两党抗日态度等汇报给救国会常委。1933年3月,张希尧与常委车向忱及党影响下的爱国进步青年50多人组成慰问团到古北口进行慰问。当时长城抗战迫在眉睫,国民政府派中央军增援古北口。因前线战事惨烈,慰问团临时组成救护队,共抢救伤员2500余名,^③其行为鼓舞了士气,使他们血染疆场,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1933年6月,为鼓励冯玉祥组建的抗日同盟军,张希尧与车向忱又一次前往张北前线慰问,并组织学生救国军参加了抗日同盟军。他们在慰问中结识了冯玉祥、吉鸿昌两位爱国将领,亲眼看到这支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抗日军队军纪严明,生活艰苦朴素,作战英勇顽强,极为钦佩。他们回到救国会,将所感向常委们进行汇报,表示“关于政治方面表示对内比重大于对外,不能同意云云”。^④车、张两人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进行客观公正地分析和评价,对于救国会常委们认清国共两党的实质有一定的影响。基于他们对冯玉祥、吉鸿昌所部的认可,故北平党组织委派救国会共产党员徐靖远参加抗日同盟军,协助冯玉祥抗击日本侵略。当得知吉鸿昌被捕的消息后,徐靖远和张希尧在救国会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设法营救,未果而痛心不已。

1931年底,国联调查团即将到东北的消息不胫而走。救国会全力搜集日本侵略东北、屠杀东北人民暴行的罪证,希望转交给国际联盟,以求国际公理的裁决。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救国会宣传部成员积极响应。郑洪轩、刘韶九、张金辉等人深入东北沦陷区沟帮子、大虎山、北镇、黑山等地,搜集了大量日军侵占东北的罪证。他们通过张希尧的关系,把几千封信交付东北爱国志士巩天民、刘仲明。巩天民是奉天金融界知名人士,张希尧与巩天民早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成为亲密朋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巩天民嘱咐张希尧要做三件事:一是赶紧把日本侵占沈阳的事传出去,对外揭露日军侵占

①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报告》,《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时期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35页。

② 《王化一日记》,1931年11月11日,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

③ 郑长家:《慰劳长城抗战将士》,《一代师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④ 《王化一日记》,1933年6月6日,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

沈阳的罪行;二是托张希尧向天津《大公报》递交他写的关于日军侵占沈阳的报道;三是他与张希尧约定了今后的联系方式。^①张希尧按照与巩天民当初约定的联系方式,指示救国会宣传部的胞弟张金辉等人设法将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证据转交给巩天民。巩天民又转交给刘仲明。刘仲明是盛京医科大学教授,早年经常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与巩天民、刘仲宜、张查理、毕天民、李宝石、张韵冷、邵信普、于光远组成九人小组,正多方寻找日本侵略罪证。对其来说,救国会的材料可谓雪中送炭。他们共整理出 75 份材料,通过英国国际友人将其递交国联调查团,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中国共产党以救国会名义支持和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屈辱的东北民众纷纷组建起东北抗日义勇军,全盛时达 30 万人之多。在义勇军兴起与发展时,中国共产党制定出对义勇军的方针与政策,指出必须“积极加入这一战争,夺取这一战争的领导”。^②救国会党团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对东北义勇军的方针决议,以救国会名义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展援助工作。

为了帮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救国会地下党员举办的一个培训班,培训出关的爱国青年。1933 年,张希尧、宁匡烈、徐靖远等共产党人向救国会常委阎宝航建议成立一个救国会干部训练班,获批。8 月至 10 月,他们严格挑选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东北流亡青年,在北平西山卧佛寺秘密成立一个 100 余人的干部训练班,对外称“东北大学学生夏令营委员会”。培训班基本上由共产党人担任重要职务,如阎宝航担任班主任,张希尧负责组织工作,宁匡烈、徐大同、宋星池等人协助。^③学习内容包括:马列主义理论、时事政治、游击战术、爆破技术等。中共以救国会名义举办的军事培训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使学员们思想上经受了洗礼,许多人都向张希尧和宁匡烈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两个月训练班结束后,救国会党组织将大部分学员派往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如赵守铭被分配到哈东游击队任交通员,做情报侦探工作,^④还有一些人被派到冀东一带的根据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为组织和联络东北抗日义勇军,救国会共派了 70 多名政工人员分赴东北各地,其中包括张新生、黄宇宙、张金辉、宋黎等中共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如东北国民救国军就是在张新生的宣传和联络下成立的东北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张新生于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出关联络义勇军的救国会的工作人员。他帮助绿林“老梯子”高鹏振组建东北国民救国军,向北平救国会邀请了 20 多名军事专家帮助整编队伍,改组后的救国军下设 8 处 2 个团,^⑤制定严明的军纪,学习军事知识和战术方法等,该部战斗力和素质明显提高。救国军增加到千余人的规模,并与日军在辽西地区展开了激战,影响力扩大。张新生后来以笔名王立川在《新中华》上发表了《血战归来》,向全国人民介绍了辽西抗日队伍与日军作战的情况,从而使东北抗日义勇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赞颂。此外,进步青年黄宇宙也出关将张学良的委任状交付东北军旧部唐聚五,晓以大义,对其进行策反。1932 年 4 月,唐聚五在桓仁誓师起义,组建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五动员 14 个县的抗日力量,转战通化、临江、清原、柳河、宽甸等地,成为辽东最大的抗日武装。中共影响下的救国会人员出色完成联络义勇军的任务,有力地策动了各地举兵抗日。

救国会共产党人还争取和改造各种抗日武装力量。东北义勇军成分复杂,队伍的基本构成是破产农民、乡村手工业者、民团武装,普遍缺少训练,军纪亟须整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

① 张洁等:《巩天民的传奇人生》,沈阳:辽海出版社,2015 年,第 34-35 页。

② 《中共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1932 年 3 月 31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0,第 52 页。

③ 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纪念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53 页。

④ 赵守铭:《抗日战争的回忆》,未刊稿,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

⑤ 王立川:《血战归来》,《新中华》第 11 期(1932 年 9 月 10 日)。

委、中共河北省委分别派出一大批党团员、进步青年到东北抗日义勇军队伍中工作。其中救国会的中共党团员大多隶属于中共河北省委或中共北平市委,但也有一部分人出关后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联系。他们在队伍中担任政治、军事参谋等职,针对队伍散兵游勇、成分复杂、军纪懒散等弱点,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帮助改造队伍,学习战略战术,同时积极争取东北抗日义勇军,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如李兆麟、张一吼等一度到东北义勇军第21路军担任指导工作。1931年11月,受中共北平市委、军委派遣,冯基平、李兆麟、王希凡、董必臣等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4路军耿继周队伍开展工作。共产党员王义忱同志被派到第48路郑桂林部工作,帮助他改造队伍,进行革命斗争,后党组织又陆续给郑部派去30多名党团员。在中共的影响下,东北抗日义勇军第4路耿继周部、第48路郑桂林部、第21路赵殿良部等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党的抗日主张,部队战斗力得以大幅提高。

东北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因组建东北义勇军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与救国会和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共产党员刘澜波作为黄的秘书,一方面帮助他组建东北义勇军,同时还建议他与北平的救国会保持密切联系,因而得到救国会的高度重视。黄显声和部下熊飞被选为救国会委员,熊飞负责与救国会联系。黄显声在1931年12月18日亲赴北平参加救国会军事会议,共同商议收复计划,将组建和委任东北抗日义勇军事宜交付救国会负责。^①1932年初刘澜波随黄显声入关,与中共北平市委接上了关系,也被派到救国会,担任宣传干事。^②他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各种抗日力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同时抓紧做黄显声部的改造工作。

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救国会成员不仅派人出关联络各地义勇军武装抗日,而且亲自组建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辽阳小堡一带是救国会李兆麟、张一吼、杨寿天的家乡,他们经救国会允许,1931年底回家乡组建抗日队伍。1932年初,中共北平市委和军委先后派冯基平、林郁青、夏尚志等党团员也到辽阳小堡。经过努力,他们于1932年3月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4路军,共3500人,李兆麟实际上担任着全军领导责任。该部组建了反帝大同盟东北支部、妇女会、少年先锋队,建立共青团支部。其队伍扩大到六七千人,曾经和第21路义勇军赵殿良部配合共同攻打沈阳。此外,张希尧还在北平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东北学生军出关抗日,其中许多是救国会的爱国青年。虽然这支队伍不带部队番号,但它“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青年最初活动的一个武装团体”。^③由于需要紧迫,学生军只训练了两个月时间便被派往东北,学员张金辉、苗可秀、赵侗等人或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或参加到东北义勇军军中,很快成为抗日军事骨干。

五、结语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1931年9月27日成立,到1933年7月31日解散,存在了不到2年时间。它率先发起东北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援助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斗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救国会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能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以其历史责任和担当发出了抗日救国的第一声呐喊,旗帜鲜明地武装反对日本侵略,促进了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救国会,推动了东北抗战及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让救国会的地位与影响不断扩大,成为东北流亡民众复土还乡的第一个战斗旗帜。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促使救国会发展壮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九一八事变

① 依据《王化一日记(12月18日)》以及阎宝航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概况》(《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有关内容整理。

② 刘澜波:《参加革命小传》,未刊稿,中组部档案室存。

③ 于毅夫:《九年来东北人民英勇奋斗的总结》,《反攻》9卷2期附册。

后,中共针对东北特殊性酝酿建立反帝的抗日统一战线,并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中付诸了实践。虽然中共对救国会的统一战线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主要是下层统一战线,但在救国会存在的近 2 年时间里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广大的爱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树立起坚定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念。李兆麟、张新生、张希尧、郑洪轩等在救国会工作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宋黎、张金辉等人在救国会被取缔不久也加入了共产党。以后,救国会的一些爱国青年也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其次,救国会常委们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政治认同。救国会时期,救国会常委们需要思考和抉择一个可以依靠和信赖的政党,从而帮助他们进行抗日救亡、打回老家去。最初他们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但从 1931 年底救国会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遭拒,到 1933 年救国会被国民党强行解散止,救国会常委们已彻底认清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本质。部分救国会常委曾追随青年党进行抗日,但随着青年党分裂和霍维周被暗杀,青年党影响力降低,也改变了救国会人员依靠它的想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对救国会的支持,让救国会常委们对中国共产党好感与日俱增。尤其是 1935 年底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确立后,他们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高度重视,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他们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新组建了东北救亡总会。一部分救国会常委如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等人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人如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成为党领导下的“左”倾爱国人士。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无论是救国会时期,还是全民族抗战时期,都是团结东北流亡人士为收复东北和全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制胜武器和法宝。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Northeast People's Anti-Japanese and Salvation Congress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ZHANG Wanjie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Tropical Ocean University, Sanya 57202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ssued the anti-Japanese declarations and telegrams several times, calling on the Chinese people to resi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with arms. Under its influence, the Northeast Exiled Group, which had been exiled into Shanhaiguan, established the Northeast People's Anti-Japanese Salvation Association and took the lead in launching the Northeast People's Anti-Japanese Salvation Movement in the whole country. A large number of CCP member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Anti-imperialist Alliance fully supported this anti-Japanese Salvation Group. They made great efforts into the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and established the Anti-Japanese Volunteer Army, thus highlighting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Arm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addition to the CCP's capability in objectively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and formulating a correct policy at a time of national crisis, the CCP's united front policy is the magic weapon of unity and victory, accumulating certain experienc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for the whole country.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rtheast People's Anti-Japanese Salvation Association; Northeast Anti-Japanese Volunteers

【责任编辑 孙 琰】

作者推介

张万杰,1974年出生,辽宁彰武人。现任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方向带头人,海南省拔尖人才。兼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九一八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张氏帅府博物馆张学良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等。同时为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辽宁省党史专家库成员等。

张万杰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1996年到2019年就职于辽宁社会科学院,曾担任科研处副处长、地方党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是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近现代史学科(辽宁省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辽宁社会科学院抗战文化研究中心及中国特色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获辽宁省百千万人才之“百”层次人才、“辽宁省中青年哲学社会科学骨干”、辽宁社会科学院“首批青年专才”等荣誉称号。2010-2011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委派,赴丹麦奥胡斯大学地区与历史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2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交流和研讨。2020年5月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张万杰的研究方向是东北地方党史、抗日战争史、东北救亡运动史等。从事科研工作25年中,独立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社科基金项目8项,其他省级以上项目20余项。出版专著《救亡图存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本研究》《为了收复东北的那一天——张希尧传略》等3部,合著5部。在《抗日战争研究》《历史教学》《东北师范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辑刊》《湖北社会科学》《辽宁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50多篇,包括南大核心(CSSCI)期刊发表论文12篇,北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篇。其中,《有关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探讨》等多篇获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转载观点、被引等。《刘澜波与东北救亡运动》荣获第十届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张万杰在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科研成果的转化。所撰写的《关于加强西安事变前后党在东北军统战工作研究的建议》《加强辽宁地区中朝历史研究的建议》等5篇研究报告获得副省级领导以上批示。

张万杰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史研究,提出“东北救亡群体”“救亡图存东北魂”等史学概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取得了一些突破。曾对刘澜波、张希尧、高崇民、王化一等党史人物做过专题研究,对西安事变期间、武汉期间的东北救亡运动有过系统研究,现在正在探索东北流亡民众的文化抗战、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救亡运动关系等研究。曾作为专家接受过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辽宁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大连电视台、沈阳晚报等关于抗战救亡系列的专题采访10多次,向社会上传送正确的党史观和正能量,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